

乾隆皇帝與〈富春山居圖〉

大凡談論〈富春山居圖〉，就不得不提及廣為流傳的乾隆皇帝「真贋」之辨。儘管這是一個長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藝林風雲」，同時也是日後無用師本與子明本真偽論辯幾經反覆的主要論題。然而一般論者通常只止於泛泛而談，或語焉不詳，而未曾見有深入具體情形者。究竟乾隆皇帝當年「真贋」之辨的經過如何，以及他持續半個世紀的展對、題跋帶給我們怎樣的「翰墨緣」（按，子明本弘曆乙卯春閏題識），這對於從另一個視角去識讀〈富春山居圖〉以及子明本的歷史價值與普世意義，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圖一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長至後一日題跋
圖二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穀雨日題跋
圖三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清和月題跋
圖四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皐月題跋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家道中落的安氏（即安岐、安忠元家族）經大學士傅恒向弘曆進呈了包括這一卷早已揚名天下的〈富春山居圖〉（即無用師本）在內的數件名迹。正是此次進呈，開啓了前後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的真贋論辨史，這在客觀上為後世鑒賞者提供了極好的研究範例，有助於演進古書畫考辨的學術方法，夯實學理基礎，進而對繪畫史的梳理與構建產生積極影響。

時間回到乾隆十年冬，正當張照（一六九一—一七四五）、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董邦達（一六九九—一七六九）諸大臣奉旨編纂《石渠寶笈·初編》（註一）完成後不久（從乾隆九年二月開始編纂，至次年十月完稿。），弘曆見到了子明本。起初他並不認為這件長卷就是膾炙人口的〈富春山居圖〉。因為款中並無「富春」二字，而且他是在年夏天沈德潛所進呈的詩古文稿中對〈富春山居圖〉的大致情形已經有所瞭解。但他又認為子明本是黃公望另一件「山居圖」，而不知子明本其

實只是一件贗鼎之作。於是，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弘曆從乾隆十一年春天、穀雨日、清和月、皐月……在子明本上一再作跋，讚歎有加，屢題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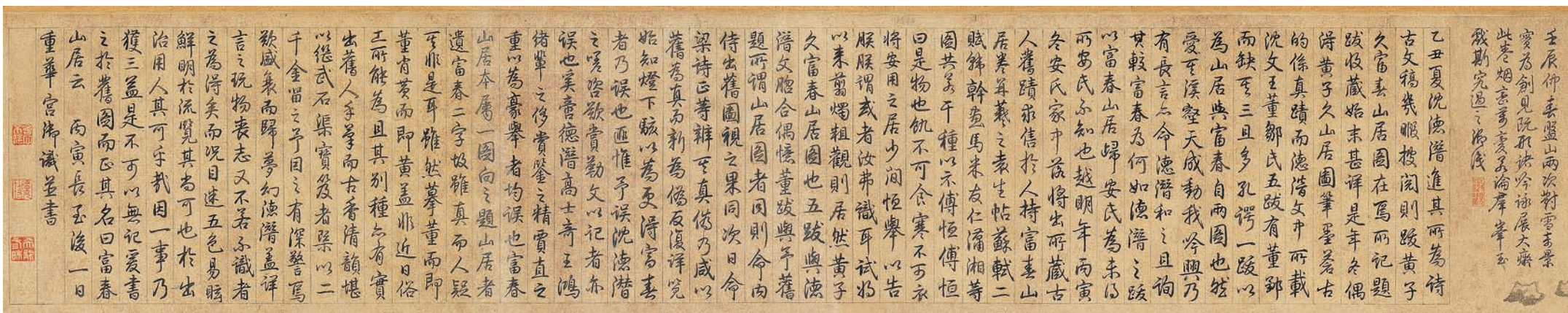
世傳〈富春山居圖〉為黃公望生平傑作。此卷寫山居風景，巖壑平遠，曠若千里，未識與〈富春圖〉孰為先後……（圖一）

大癡道人黃子久，詩中元白書顏柳。富春大嶺稱絕作，膾炙都人士之口。金題玉躡標山居，然疑即是〈富春〉否？（圖二）

畫家貴正不貴奇，大癡此卷三昧知……試評此畫得所否？更須紙尾揮顏碑……每閱此卷，愛玩不置，因命學士沈德潛題其後，而自記以詩。（圖三）

按，鄒之麟此跋直以為〈富春〉，而題籤曰〈山居〉，沈德潛所見〈富春山居〉云又非此，姑俟他日之辨。（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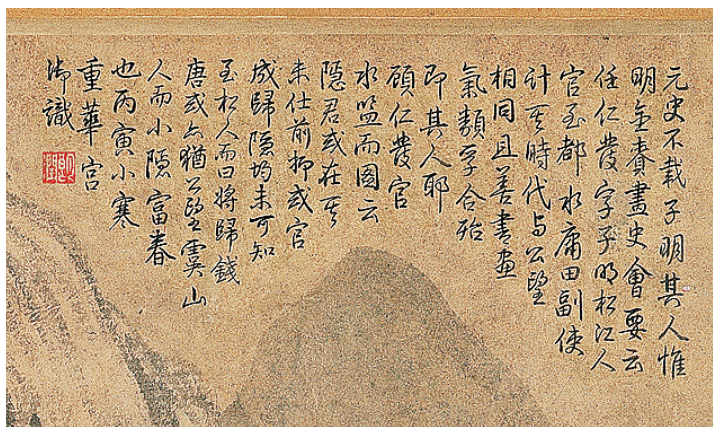
其間他曾懷疑子明本或許就是那件聞名遐邇的〈富春山居圖〉，甚至至在四月（清和月），他在「每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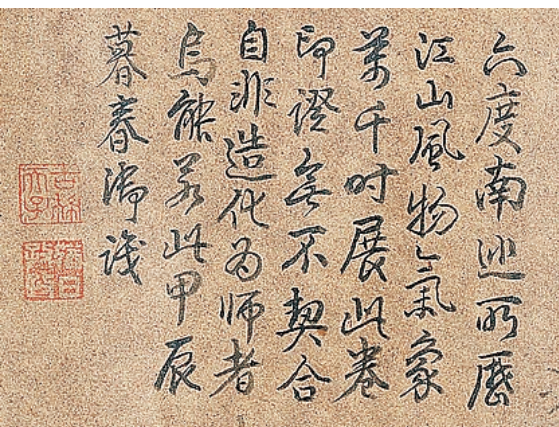
圖五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長至後一日題跋

及至見到安氏所呈，弘曆「剪燭粗觀，則居然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也」，「駭以爲更得富春」云云。然而由於憶及董（其昌）跋與子明本相同，「則命內侍出舊圖觀之，果同。」（按，其實兩者出入頗多）

第二天，他召令梁詩正諸大臣對子明本與無用師本作鑒別，在一片附和聲中，早一年入宮的子明本



圖六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小寒日題跋



圖七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84年春春題跋

成了所謂的〈富春山居圖〉，而真正的〈富春山居圖〉，即無用師本則被斷爲「贗鼎無疑」。弘曆在長至後一日作跋云：「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爲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迹……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富春〉、〈山居〉本屬一圖，向之題『山居』者，遺『富春』二字，故雖真而人疑其非是耳。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而即黃，蓋非近日俗工所能爲。且其別種亦有實出舊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因一事乃獲三益，是不可以無記，爰書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圖五）經過弘曆及其群臣的鑒賞品評，隨即徹底改變了他在此前曾懷疑〈山居〉與〈富春〉或爲二圖之看法，從此便有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富春山居圖〉真贗之辨。丙寅（一七四六）小寒日，他還將「子明」誤考爲元代畫家任仁發。（註三）（圖六）從而子明本作

卷，愛玩不置」的情形下，「因命學士沈德潛題其後」，敕命曾見過〈富春山居圖〉（按，無用師本）並兩次作跋詳記的老臣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詩題其後，以證已見。沈自然只得從命應和：「畫師如將將兵兼正奇。大癡富春山居之圖世所知。蘭亭右軍神到候，生氣空湧何淋漓。此卷與會不相亞，筆所欲赴神先之。同連嶺複勢合還，偶然忽斷便有雲相隨。想其解衣磅礴處，著墨飛動奕奕軒鬚眉。上追右丞雪江幅，同音笙磬夫何疑？聖人得此屢評品，探抉亭毒窮端倪。江山萬里入毫楮，大造在手非關思。僕命小臣題紙尾，迫窘詰屈安能爲。昔年曾跋〈富春〉卷，今聞此本俯仰興齋咨。天章在上敬賡和，秋蛇春蚓敢望岵嶠山尖碑。」（註二）在以上詩題中，沈德潛顯然大有言外之意，無論是「大癡富春山居之圖世所知」抑或「迫窘詰屈安能爲」還是「秋蛇春蚓敢望岵嶠山尖碑」均是委婉而又自嘲式的回應。

經過大半年的等待，到了冬天「姑俟他日之辨」也就不期而至了。

爲〈富春山居圖〉的真迹與米友仁〈瀟湘圖〉、江參〈千里江山圖〉等以「畫卷上等」貯於畫禪室。

縱觀乾隆十年至六十年前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清高宗弘曆陸續在子明本上題跋吟詠，或快雪時晴，或避暑山麓，或東巡或南巡或西巡……隨行展對，即興比照。正如他在甲辰（一七八四）年暮春所題御識：「六度南巡，所歷江山風物氣象萬千，時展此卷印證，無不契合，自非造化爲師者焉能若此。」（圖七）直至在卷首題上「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並鈐上「太上皇帝」、「十全老人」等印，方才罷手（此時已幾乎無處可題）。由此，弘曆與子明本結下了足可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不解之緣！

雖然弘曆當年真實的心理狀態無須數百年之後的我們妄加猜測，但這不妨礙我們從各個細節去深入解讀、剖析這場真偽論辨的前前後後，甚至還可以運用近現代以來的心理學成果，去揭示某些更接近於事實的「真相」。

世傳富春山居圖為黃子久畫卷之冠昨年得其為山居圖者有董香先鑒跋時方謂富春圖別為一卷屢題寄意後於沈德潛文中知其流落人間庶幾一遇為快丙寅冬或以書畫求售多名賢真蹟則此卷在焉上有沈文王鄒董五跋德潛所見者是也因以二卷並觀始悟舊藏即富春山居真蹟其題籤偶遺富春二字向之疑為兩圖者實誤甚矣鑒別之難也至董跋兩卷一字不易而此卷筆力柔弱其為贗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不妨並存因并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續入石渠寶笈因為辨說識諸舊卷而記其顛末於此俾知予市駿雅懷不同於侈收藏之富者遠成為葉公之好耳

乾隆御識

臣梁詩正奉

勅敬書

圖八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本） 乾隆皇帝於1746年冬題識（梁詩正書）

首先，弘曆鑒賞水平不高，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經他誤鑒的作品亦非僅此一件。但在他對子明本「屢加品評」、「每閱此卷，愛玩不止」、「的係真迹」的情形之下，其臣子惟有附和「聖諭」，這在皇權社會是最正當不過的君臣之道。儘管此次真偽論辨是一場由皇帝親自召令，貌似極為鄭重其事的鑒別會，但也無人會直言相告，冒犯龍顏，正值盛年的弘曆自然也深諳此理。

富春疑案參來久，今喜辨明楊即柳高王目迷何足云鑒創德潛誤天口我非博古修鑒是還應別否沈文王氏乃投刀華亭晉陵仍左右始識流傳抵一國珠珠安可同臨貽笑予亦永索元珠不識元珠吾固有如浮海者必由何山登山者必歷艱險云露柱即燈籠坐令優孟空而多需受天下詩人即楚詞試與觀之應覺醜還侯長言當自紅庶使此圖更因壽

圖九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47年春正題跋

其次，他在題識無用師本（梁詩正書）中稱：「丙寅冬或以書畫求售，多名賢真迹，則此卷在焉……」（圖八）這一不經意的表述多少折射出弘曆內心世界真實的一面。

再次，如前所述，《石渠寶笈·初編》在乙丑十月已完稿，而此後弘曆先後收得子明本與無用師本，並召集群臣作出鑒別，隨即在丙寅長至日「正其（按，即子明本）名曰〈富春山居圖〉」。但弘曆並沒有就此罷休，反而是在丁卯春正再作小字長跋：「富春疑案參來久，今喜辨明楊即柳。高王目迷何足云，壓倒德潛談天口……還續長言當自訟，庶使此圖更因壽。」（圖九）到了夏日，老臣沈德潛又不得不恭和御制元韻曰：「山居有圖傳子久，救命賦詩日在柳……藝苑遭逢會有時，好配右丞千載壽。」（註四）顯然，此時弘曆依舊沈浸在真偽之辨中而久久難以平息，他還需要像沈德潛這樣的明白人來反復認同自己的鑒別結論。一直到乾隆十三年夏五月之後，才將子明本補入《石渠寶笈·初編》卷十二後面附錄

中的最後一件。（註五）其中所錄「乾隆戊辰夏五御識」的題跋也是續補三十五件作品中之最晚者，個中消息足以引人沈思。

尤為重要的是，弘曆在丙寅冬真偽之辨後不久，曾敕梁詩正書「御識」于無用師本卷首，其中有「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不妨並存。因並所售，以二千金留之，俟續入《石渠寶笈》」云云。

（圖八）然而弘曆竟然無視自己一言九鼎之尊，反而屢食其言。按《石渠寶笈·初編》凡例：「一，是編所收皆古今名迹，雖或臨本逼真亦置之次等，題款俱仍其舊，而真贋自別……」（註六）然而在補入子明本的同時，卻未見錄入「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的無用師本。又，自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正月開始編纂《石渠寶笈·續編》，至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成書，（註七）但無用師本依然未見「續入」（此時負責初編的梁詩正等人均已謝世）。與之相反，他在乾隆丙午（一七八六）曾敕金士松在無用師本卷後補書沈德

黃子久富春山居圖係本長尺許潤三丈餘寫付無用和尚者起至正七年戊辰正月未成時恐人巧取豪效先書無用本號後綴成之見子久自語中波有沈石田文文王百穀董思白鄒衣白五跋其人及明初人改歸石田時已經脫落矣按子久於元四大家中為冠而此卷又為生平神來之筆比之右軍蘭亭不虛也入國朝歸高江村居事以六百金收之波歸王儼齊司農亦如其真司農沒僕人挾之來蘇適月無售者旋轉之維揚矣計居事司農品地聲勢極一時之盛今不三四十年如春花飄雲煙解散而山人筆墨長留人世間洵難華難久而淡寂者多味外味也雍正戊申觀於黃鵬坊某氏時六月二日戊申歲於黃鵬坊某氏閱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時儼齊王司農家人持卷求售索直千金吳中無大力者持之維揚波亦不知所之矣乙卯秋予寓京師程子純江於安氏借得此卷邀予往觀不啻重見故友也畫在明代為白石翁物後歸吳興後歸王明卿入國朝歸高江村後歸王儼齊迄今在三韓安氏予既幸前賢名流傳人代著有見物呵護其間又以文人學士不能有而為之主者惟珍寶玩之多貴直之重以為豪華此卷未為得而後有也如白石翁者或更當歸之右沈德潛二跋乾隆丙午仲冬月 臣金士松奉勅補書

此石渠寶笈次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乃安岐舊物沈德潛所為兩跋自明沈周至本朝高士奇王鴻緒所珍藏歎賞者及歸真蹟久登秘笈是卷特仿本之佳者耳夫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其地相連清於流別者更何足道若沈周以下皆數百年來所稱賞鑒家而此幅又致佳本當其贊美題識流傳珍奇因自以為人世希有壯觀而不知一邱一壑之勝不足與入禮樂文章之府也至伏讀御製公望山居圖詩公望之靈思神筆其仰

精義要道之發以公望之靈思神筆其仰索賞之有真而即此規仿精良者亦登次等道無素材義有差等仍命書沈德潛兩跋於卷末更徵化裁含覆之廣大也夫臣梁國治臣劉墉臣曹文植臣彭元瑞臣王傑臣金士松臣董誥拜手稽首恭跋臣金士松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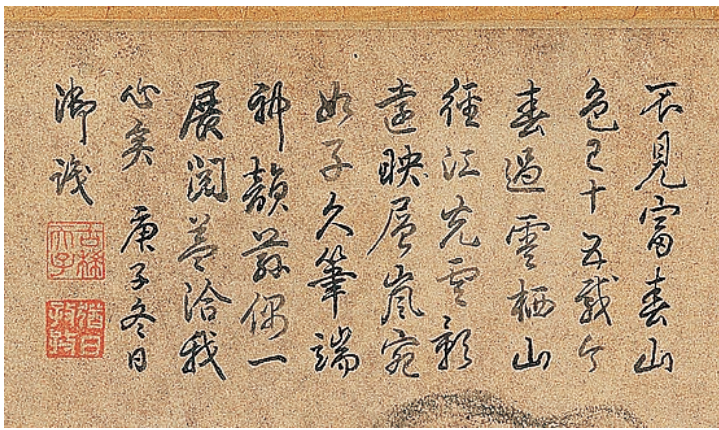
圖十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86年命七大臣合作跋

潛二跋，又命梁國治、劉墉、曹文植、彭元瑞、王傑、金士松、董誥等七位大臣作合跋：「此《石渠寶笈》次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乃安岐舊物。沈德潛所為兩跋，自明沈周至本朝高士奇、王鴻緒所珍藏歎賞者。及歸天府，以校石渠舊藏〈富春山居圖〉，始知公望真跡久登秘笈，是卷特仿本之佳者耳……至伏讀御制題公望真蹟記，因一事獲三益，觸類於出治用人。即古人一筆墨之妙而觀其通見其大，蓋無在非精義要道之發，以公望之靈思神筆，具仰睿賞之有真，而即此規仿精良者，亦登次等。道無棄材，義有差等，仍命書沈德潛兩跋於是卷末，更徵化裁含覆之廣大也夫。」云云（圖十），對四十年前的那場真偽之辨再作肯定之論，並推演為意味深長的為政之道。這些受到警示的大臣們自然也就不敢在五年之後編纂《石渠寶笈》續編時對無用師本加以著錄了！這樣的良苦用心，又何嘗不是弘曆內心真實傾向的隱約呈現呢？

歷史老人往往就是這樣，當我們

層嵐，宛如子久筆端神韻，茲偶一展閱，蓋洽我心矣。」（圖十三）如此說來，弘曆一生曾于辛未、丁丑、乙酉、庚子的春天先後與富春山水四次親密相對——「相看兩不厭」，並屢加題記，不可謂不鍾情於此地風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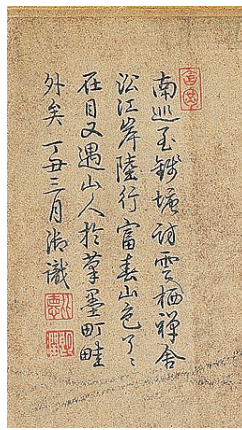
儘管真正的〈富春山居圖〉（按，即無用師本）要晚至嘉慶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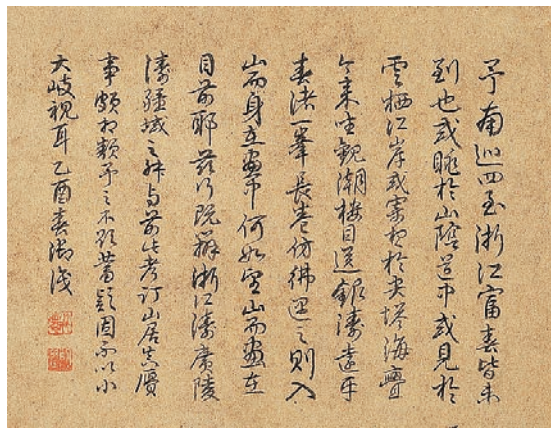
圖十三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80年冬日題跋

熱切地追溯真相時，卻不得不陷入捲歎息的境地，在現實的螢幕上驚人相似地一幕幕加以重現。

值得一提的是，弘曆在位六十年，前後六次南巡，（註八）均在子明本上留下相關題記。當收得子明本過去整整二十年之後，經辛未



圖十二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57年三月題跋



圖十一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本） 乾隆皇帝於1765年春題跋

（一七五一）春、丁丑（一七五七）春、壬午（一七六二）春三次南巡，在乙酉（一七六五）春四下江南之時，他在子明本上作了如此御題：「予南巡四至浙江，富春皆未到也。或眺於山陰道中，或見於雲棲江岸，或寄想於尖塔海壘。今來坐觀潮樓，目送銀濤遠平春渚，一峰長卷彷彿遇之，則入山而身在畫中，何如望山而畫在目前耶？茲行既辨浙江濤、廣陵濤疆域之外，與前此考訂山居真履事頗相類，予之不欲蓄疑，固不以小大歧視耳。」（圖十一）

從丙寅（一七四六）冬的「正其名曰」，丁卯（一七四七）春的「長言自訟」，戊辰（一七四八）夏的「一再展玩」……弘曆最後以乙酉春「事頗相類」的御識對當年的真偽之辨作了了結。此後在子明本上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衆多題識中，他再無片言隻語加以提及，似乎從未有過此事，真可謂往事如煙了！當然，弘曆在這個題跋中，也表明了自己數次南巡而未曾到富春一遊的緣由——「入山而身在畫中，何如望山而畫在目前

耶」，這顯然移用了蘇東坡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意而作一自我釋然。他再三對富春山水遙望、寄懷，但終於沒有正式駕幸他的近臣董邦達的家鄉（董邦達，富陽人，時任禮部尚書。作為弘曆所欣賞的山水畫家，他曾為子明本的引首配上了一幀山水小品）。

事實上，在弘曆第二次南巡之際，他也曾邂逅富春山水，並作跋為記：「南巡至錢塘，訪雲棲禪舍，沿江岸陸行，富春山色了了在目，又遇山人於筆墨町畦外矣。」（圖十二）雲棲禪寺在杭州與富陽相鄰的五雲山雲棲塢，其西山塢則有雲棲竹徑。弘曆在「訪雲棲禪舍」後，又「沿江岸陸行」，於是「富春山色了了在目」——這也就意味著弘曆在他四十七歲那年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番富春山水！而在其他多則題跋中，他對富春山水一再致意，神往不已。庚子（一七八〇）春，已是七旬老人的弘曆故地重遊，是年冬，他在子明本上作記遙憶：「不見富春山色已十五載，今春過雲棲山徑，江光雲影遠映

年（一八一五）二月至次年閏六月間編纂的《石渠寶笈·三編》（註九）時，才予以錄入，此時距自詡為「十全老人」的清高宗弘曆作古已整整過去了十五年。雖然奉旨編纂三編的英和、黃鉞、姚文田等人並未臧否前後兩卷〈富春山居圖〉的真偽，但他們在《乾清宮藏十·列朝名人書畫》中有關「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一卷」（即無用師本）詳盡記錄的最後作了如下三行小字題注，頗有言外之意：「謹案此圖載張丑《清河書畫舫》，諸跋語載于永譽《畫彙考》中。鄭之麟字臣虎，號衣白，武進人。明季進士，考見續編。」云云（註

十）。惟一值得慶幸的是，這件傳世名迹除了增添卷首一跋之外，得以在清宮靜靜地度過近二百年的春風秋雨，畫面基本完好如初。而那件被弘曆視為真迹的子明本則早已滿紙題跋，壅塞不堪，以致難以辨識了。此等禍福相倚，又何嘗不是歷史老人的睿智幽默也！應作如是觀。

縱而觀之，乾隆十一年冬天的真偽之辨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歷史的錯誤很難得可以如此從容地加以修正，在此後的二百六十餘年間一直延續著這一進程。由此成就了中國繪畫史上最為令人矚目的論辯場景。

作者任職於浙江大學

註釋

1. 初編編纂人員共十人。除上述三位外，還有勵宗萬、張若靄、章嘉胡士克圖、莊有恭、裘日修、陳邦彥、觀保等人。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初編，上海書店影印版，1988年，第248頁。
2. 同上書，第1245頁。
3. 任仁發（1255—1327年底或1328年初），詳可參見拙著《〈富春山居圖〉真偽》第207頁注44，其卒時距子明本款題戊寅（1338）已是十年之久，遠不相接。
4. 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初編，第1245頁。
5. 同上書，第1241—1245頁。
6. 同上書，第246頁。
7. 續編編纂人員共十人，包括王傑、董誥、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保、瑚圖禮、吳省蘭、阮元、那彥成。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續編，第7頁。
8. 《清史稿》卷十一至卷十五，高宗本紀二至六。
9. 三編編纂人員共十一人，包括英和、黃鉞、姚文田、吳其彥、張麟、顧皋、朱方增、吳信中、龍汝言、沈維鐸、胡敬。參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三編，第1—4頁。
10. 同上書，第522頁。